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在兵工厂缴获大炮。

自朝鲜的军事天才，1919年为争取祖国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他付出“全家尽节”的代价，只身流亡中国。他很快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把反帝反封建视作朝中两大兄弟民族的共同使命，并为之奋斗终身。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已是黄埔军校主任教官、军队仕途光明的毕士梯却坚定跟随共产党，在遍布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受领党组织的任务，辗转来江西苏区，长征中当上红军干部团参谋长，为中革军委打前锋，从乌江一路战斗到腊子口，1936年为掩护党中央东渡黄河身中数弹，弥留之际，他只问了一句：“前方情况如何？毛主席过河没有？”得知毛泽东和党中央已顺利渡河，他才安详地闭上双眼。

何止是毕士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从不畏惧强暴，他们用炽热的爱给中国革命事业添加浓墨重彩的一笔。“你肯定听说过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这三位美国记者让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形象进一步传播世界，尤其这些工作大多在上海完成。”王冷一提到，这三个美国人的姓氏都以英文字母S为首，人们习惯叫“三S”，“他们于1924—1928年间来到中国，而上海恰恰是‘三S’进入中国的门户，是他们从事进步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他们反映中国革命的报道和著作也基本在这里写作或发表”。

1927年5月，斯特朗乘美国邮轮抵达反动派屠刀挥舞的上海，她遍访孤儿院、教堂和浦东工业区的劳工服务站，确实了解国民党残害共产党和工人的暴行，向世界报道了上海“4·12”大屠杀真相。20年后，斯特朗成功结束在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后又来到上海，住到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忙于写作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她写的关于延安情况的材料，也是从上海送到印度、菲律宾、日本以及欧洲各国去发表的。她在纽约左翼刊物上发表的题为《毛泽东的思想》一文，着重写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思想，介绍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方面

的创造，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史沫特莱来华更早，1923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时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华，1929年春夏间到上海，她在上海的“家”成了地下革命活动联络站，苏区重要干部来沪常落脚于此，像红十军军长周建萍就在她家隐蔽养伤。她还不顾个人安危，掩护一些中国同志逃脱追捕。史沫特莱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红军长征消息的外国记者，1931年，柔石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在龙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后，史沫特莱与鲁迅等中国作家一同起草抗议宣言，并译成英文、俄文、日文，在国外报刊上发表。

斯诺是1928年来到中国，上海是他走向中国各地考察研究的出发地。在上海，斯诺和宋庆龄建立深厚友谊。宋庆龄介绍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继而访问陕北根据地，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报道了“人类历史上伟大革命之一的基本历程以及投身这场革命的人们”。1938年，《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后，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协”采取推销购书券的办法发动青年购买阅读，在上海青年中产生巨大影响。同时，斯诺痛恨帝国主义、买办统治下的旧上海，称其为“中国脸上上的政治溃疡”，他在著作中无情揭露帝国主义霸占上海的史实和国民党残害爱国进步人士的罪行，报道了“1930年一年，上海街头和河道里发现2.8万具尸体”等事实，激发了人们的革命激情。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观察‘三S’，他们的生活满可以富有诗意情调，像史沫特莱在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长期租下独门独院，犹如‘大隐于市’，而斯诺的稿费也足以让其在公共租界过着十分体面的生活。”王冷一表示，但同情并支持中国革命的出发点，让他们在上海因志同道合而成为好友，正如史沫特莱留下的名言——“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正如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里写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也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代表人间正道，当1949年4月百万解放军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之际，正在巴黎和布拉格出席全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各国进步政党与知名人士无不欢呼雀跃。主持布拉格大会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多尔达刚拿到解放军占领南京、正向上海进军的电报，当即中止会议，向在场的17国代表团宣读喜讯，全场起立欢呼了足足半个钟头。“为什么你们进行着战争，和平拥护者却如此热爱你们？因为人民军队的胜利